

文化的 语言视界

——中国文化语言学论集

上海三联书店

申小龙
张汝伦
主编



责任编辑 蒋安立
封面设计 桑吉芳

文化的语言视界

——中国文化语言学论集

申小龙 张汝伦 主编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三联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文化印刷厂印刷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5 字数：250000

印数 1—2000

ISBN7-5426-0148-2/H·1

定价：8.00元

目 录

文化的语言视界(代序)	张汝伦	1
文化断层与中国现代语言学之变迁	申小龙	50
方言与中国文化	游汝杰 周振鹤	84
汉语言史与民族文化史	余志鸿	100
“无言”·意义·文化	鲁四彬	116
多域价值、宇宙特性和人本观念		
——论古汉字在华夏文化心态中的“框架承重”	赵 虹	133
汉字改革的科学性与民族性	晓 琰	165
在文字的背后		
——略说东巴文字中所见纳西族先民的意识特征	王元鹿	180
从《说文》词义系统探求古代汉民族的“分—合”观	宋永培	188
价值：由训诂意义再构造想到的	李亚明	209
古汉语词汇研究与人类语言学	冯 蒸	221
试论语义范畴之文化价值	张 黎	235
“娶”与“嫁”的语法对立和汉民族		
对婚姻的集体无意识	刘丹青	246

汉语修辞的文化意义说略	郭友鹏	253
汉语近体诗声律模式的物质基础	张洪明	273
论《诗经》《风》与《雅》的区别以及 《诗经》内部语音差异的性质	钟敬华	292
秦人逻辑论纲	朱晓农	301
汉族人名与汉民族文化	王建华	323
平衡心理与汉语特征	苏宝荣	340
普通话家庭称呼词语在黄冈话中推移情况的分析	孙玉文	349
论双语现象与双文化现象	张 伟	355
论差异交际理论和语言变异理论的异同 ——交际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一项比较研究	姚亚平	371
编 后 记		391

文化的语言视界

(代 序)

张 汝 伦

—

本世纪人文科学的研究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语言研究成了人文科学家们共同关心的焦点，不仅语言学研究本身在本世纪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它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给予其他人文科学学科以重大的影响；而且其他各门人文科学学科也纷纷将目光转向语言研究。这就为人文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渗透和融合奠定了切实的基础，给新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各门与语言有关的新学科的不断出现，更是向人们表明，语言研究在人文科学研究中占有何等重要而基本的地位，语言研究所包容的范围又是何等宏大而广阔。如果说数学研究是一切自然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的话，那么语言研究也可以说是一切人文科学研究的基础。随着人文科学的发展，这一点将越来越清楚。

在人对世界、对自身的困惑、探究和理解的无穷进程中，语言占有核心的地位，这决不是偶然的。正如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所说的：“语言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足以表现人的特点的”，它“是打开人们心灵深处奥秘的钥匙。它是人们表达思想

的至高无上的工具，是维系民族的纽带，是历史的宝库”。^①语言又是我们所感知、所体认和理解的世界形式。人是按照他语言的形式来接受世界的，这种接受形式决定了他思维、感情、知觉、意识和无意识的格局。语言形式之外的世界对人来说既无法想象，也不可思议，在这种意义上它只是一个“无”。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语言就是我们的世界。

实际上，人的世界永远是多维的、多层次的，是一个广泛而复杂的全体。把世界理解为仅是我们所生存的那个自然环境或自然界，那只是把人的世界等同于动物的“世界”；可严格地说，动物没有“世界”。它们只有“环境”。人则不然。我们不仅生息于自然界，也生活于社会；不仅生存在文化与价值里，也生成在历史与未来中。世界不仅是时间与空间的统一，而且也是事实与价值、事件与意义的统一。思维与想象、实践与创造、理解与交流、痛苦与欢乐都构成了世界无比丰富与复杂的多样性与多元性。这种多样性与多元性在语言中得到了幽深入微、巨细无遗的表现。自然科学认识的是自然世界，人文科学面对的是人文世界，艺术创造的是一个想象和审美的世界，宗教则开拓了一个神灵的世界；而语言作为人类实践最根本的组成部分和不可或缺的载体，它表现这一切，包容这一切，使之成为可能。世界的不同层次和方面在语言中得到了统一，我们正是通过语言才完整地把握了这个多样化的世界。当然，没有人类就没有语言，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语言是人类的本质特征之一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语言就没有人类，没有人类的世界。这当然不是说语言创造世界，而是说人类创造世界、创造自身的伟业，是与语言的产生

^① 帕默尔：《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11、148页。

同步开始，须臾不可分离的。语言是人类塑造世界和自我的最基本的手段与工具；但它又不是纯粹的手段和工具。纯粹的工具可以离开操作者和作用对象，可我们无法设想没有语言的人类，没有语言的实践，和没有语言的人类世界。

通常人们总认为语言只是交流信息，表达思想的工具，甚至把它看成只是一套用于人际交流的符号系统，这样理解未免过于狭窄了，容易忽略语言的本质方面。语言确实是工具，我们可以像使用其他工具那样使用它；但它又是产生工具的机制的一部分，是我们人的一部分。恩格斯说：“语言是从劳动当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释是唯一正确的解释……”^① 这就是说，并非“劳动创造语言”或先有劳动后有语言，而是语言和劳动相辅相成，同生共存，“语言甚至比物质文化的最低级发展还早，在语言这种表达意义的工具形成以前，那些文化发展事实上不见得是一定可能的”。^② 萨丕尔的这个论断应该说是正确的。动物的生存活动之所以不是劳动，是因为它们没有语言，没有思维。马克思说过：“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③ 人的劳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劳动，人完全意识到他的目的，换言之，人的劳动是受思维支配的劳动，这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之一。作为思维的基本工具，语言构成劳动的本质要素。语言不仅对于思维的表达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媒介，而且它就是思维过程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39—140页（着重点为笔者所加）。

② 萨丕尔：《语言论》，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4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本身的一部分。这表明，语言并非只是消极地表达或传递信息的符号系统，它还是世界的条理化、组织化、结构化与有序化的呈现。没有这种呈现，世界对人就不存在，就像动物无所谓世界，“动物世界”只是对人而言的那样。

正如思维要运用大脑一样，语言也要运用发音器官和听觉器官。但严格说来，它不是一种纯粹的生理活动，而是一种人的社会文化实践活动，是人的社会性本质的严格和典型体现。虽然从生理上说每个人天生具备了说话的条件，但说话的实际能力却是后天获得的，或者说只能在一定的社会人文环境中获得。正如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所指出的：“言语是一种非本能性的、获得的、‘文化的’功能。”^①印度狼孩在一出生就远离人类社会，多年后重返人类社会却无法学会说话这一事实，证明了人的语言能力的社会性和语言本质的社会性。语言研究若是忘了这个根本特性或在具体研究中没有以此作为基本前提，势必束缚语言科学本身的深入发展。长期以来，语言研究之所以一直未被人们重视，就是因为只是把语言简单地看成是一套用于人际交流的纯粹的符号系统，而对于它所包含的文化意义及其在人类生活中的根本作用没有给予足够的估量和重视。或者说，只是把它看成“器”，而没有同时将它看成“道”和“道体”。但是，如果文学研究不去研究“文学的第一个要素”——语言的话，那么这种文学研究岂不是将文学的根本置于不顾吗？同样，历史研究如果对于历史文献和记录历史事件的语言，以及历史人物本身使用的语言没有很好地掌握，那么这种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和价值就要大打折扣。至于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哲学，如果不把语言及其与世界的关系作为自己的基本研究对象的话，哲学就放弃了

① 萨丕尔：《语言论》第4页。

一个理应属于它的最为关键与根本的研究领域，哲学研究的其他问题也无法得到真正的阐明。

从外在形式看，语言确实是一种符号或符号系统，但从本质上看，它就不仅是一套符号系统，而且也是一套价值系统和意义系统，其根据即在于语言的社会性和人文性。任何一种语言的使用者在掌握使用它的同时，也接受了它所包含的文化意义和价值意义，不由自主地受它们支配。所以我们固然“不能把语言当做单是一件心理-物理的事来给它下定义”，^①也不能根据它的外在形式来给它下定义，而应该从它的实践意义和文化意义着眼来给它下定义。这样，我们对语言的理解才会是全面而深刻的，也只有这样，才能体会语言研究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研究的普遍而基本的意义。总之，“语言本身是社会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社会的现存在”。^②它忠实地表现和维持着社会各种关系的运转和变化。

二

正因为语言体现了一定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文化内容，语言必然是社会变化的一个效感的显示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文学革命”或者说语言革命为其开端决非偶然。五四运动是中国人从鸦片战争以来反省和反思自身历史命运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说在五四之前，中国人对自己民族危机的认识还只停留在国家与民族的独立与生存岌岌可危的意识上，还只是痛切地感到自己在政治状态、物质状态和文化状态诸方面可

① 萨丕尔：《语言论》第7页。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柏林，1953年，第5笔记本，第390页。

怕的落后的话，那么从五四起，中国人开始对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展开了大规模的沉痛反省和激烈批判。也就是说，中国人对自己面临的危机的反思从表层深入到深层，从外在进入内在，由社会状况到民族精神。这样，作为旧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载体的语言，便首当其冲，成了觉醒了的中国人的革命对象，是理所当然的事。“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①钱玄同的这段话尽管惊世骇俗，却也喊出了五四先驱与旧事物不共戴天的激烈情绪。

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它的时代烙印是如此之深，以致直到今天还对语言学研究有着明显的、难以消退的影响。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五四新文化所冲击的魑魅魍魉至今阴魂不散，幢幢鬼影时隐时现，五四历史批判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另一方面，正因为如此，矫枉过正，五四运动本身的缺点和局限也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形成了中国新文化建设运动中同样使人不安的一种逆反传统，这种传统在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并且，由于语言及语言研究本身的特点，这种传统的弊病在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中暴露得格外明显。

我们的前人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对照下，在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政治腐败、国计民生江河日下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面前，对旧文化传统展开批判的。奇耻大辱，深创巨痛，统统变成悲怆的控诉和愤怒的声讨。与旧传统不共戴天的仇恨，沸腾了旧时代逆子们火一样的热血，燃起了他们火一样的激情，最终化为火一样的思想和文字。在这种情况下，

^① 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五卷六号。

凡是旧的东西不分青红皂白统统烧了之的心态在所难免，加上那些吃人的魔鬼总是以传统的卫道士和护法的面目出现，在维护传统的旗号下继续干着祸国殃民的勾当，更加速了那本属正常的偏颇的蔓延和滋长。虽然公开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一直是少数，但不少人潜意识地把现代化与西化几乎等同了起来，并且以西方文化的标准作为衡量进步的标准。这样一来，势必对于传统文化缺乏全面客观的评价，给中国新文化建设增添了新的困难。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语言作为人类的基本特性和基本活动，固然有其普遍性，语言学研究应该体现这种普遍性，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语言也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特殊性。“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这一点现在是十分清楚了。”^①语言总是特殊的语言，离开了语言的特殊性，就没有语言的普遍性。语言的特殊性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和社会的特殊性。“言语这种人类活动，从一个社会集体到另一个社会集体，它的社会差别是无限度可说的，因为它纯然是一个集体的历史遗产，是长期相沿的社会习惯的产物。”^②语言学如果要成为一门普遍意义的科学，理应充分考虑到语言的特殊性的关键意义，在对各种不同类型的语言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概括出人类语言的一般特点，在此基础上方能确定语言学研究的一般范围、理论和方法。然而，由于人类语言的丰富多样性，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学家要想成为人类所有语言的专家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此，语言学与自然科学

① 帕默尔：《语言学概论》第139页。

② 萨丕尔：《语言论》第3页。

不一样,它不能由某些民族的语言学家(如西方民族的语言学家)来最终建立。具有真正普遍意义及世界意义的语言科学,理应是全世界各民族语言学家共同努力的产物。毋庸讳言,在语言科学的研究中,西方语言学家是走在前列的,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整个人类语言的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具有普遍意义。但是,在承认、引进、借鉴和学习西方语言学成果时,也必须看到,西方语言学并非尽善尽美,而是带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从广义上说是西方文化传统本身的局限性,从狭义上说是西方语言学家研究传统、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的局限性。由于他们对非西方语言并非十分了解,因此西方语言学家基本上都是以印欧语系的语言作为自己语言学研究的基本材料,他们的视点也基本上放在他们所熟悉的西方语言上。然而,人类语言的差别之大,就如同他们的文化差别之大一样。西方语言学家取得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成果,不等于他们建立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语言学理论。以西方语言作为基本研究材料的西方语言学,当然不应该与一般意义上的语言学划等号。语言学并非西方语言学家的专利品。任何一种语言的语言学家都有权、也有义务为真正世界意义的一般语言学的建立做出自己的贡献。中国的语言学家尤其应该如此。这不仅因为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汉语具有其他语言难以替代的特殊性,而且还在于汉语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理应立足于自己的语言和传统,在吸收和消化外来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同时,着手建立一个完整的汉语理论体系,并从对于汉语的独具特色的研究中,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把它们推向世界,充实和丰富人类的一般语言学理论。吸取并融合了汉语研究成果的一般语言学理论,其解

释力和适应性肯定会大大加强，其深度和广度也将得到充分的拓展。

然而，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似乎并没有足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在中国近现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似乎只有“守旧”或“西化”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这几乎成了近现代中国人的一种历史与文化的宿命。“中体西用”或“中国文化本位”的主张虽然也一直有人在大声疾呼，但不是流于一种政治口号，就是作为对“西化”的一种感情上的对立面与调整出现，缺乏更深、更高层次的思考和意识。加上某些外部原因，这种主张不是变成保守势力维护旧传统的代名词，就是一种毫无理论基础的空洞主张，成了“国粹”与“西化”夹缝中的蝙蝠，几乎难以立足。

除了近代中国本身的历史条件外，中国与西方大规模接触开始时，即19世纪中下叶，西方文化的基本信念对于中国人的文化心态也有着极大的影响，在相当意义上加强了中国人文化选择时的偏向。当时，随着工业革命的成功和西方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扩张，西方文化形成了三个基本信念：单线进化论、科学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论。这三个基本信念是有内在联系的。单线进化论似乎能够证明西方文化不仅是最先进的，而且代表了全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非西方文化只是处在以西方文化为顶点的发展序列的某一个阶段上，必然要向西方文化所代表的方向发展。而科学主义则在“实证”的口号下给这种信念打上了“科学”与“真理”的标记。这两个信念又一起证明了西方文化中心论，即西方文化代表了人类文化的普遍方向的正确性。在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中，中国人首先对西方优越的物质力量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种优越的物质力量似乎比任何东西都更雄辩地证明了上述三个信

念的合理性。中国人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三个信念，把它们当作评判和重建中国文化的基本假设和前提。更有甚者，也许是正好应了那句西谚：“第一印象是终身的印象”，中国人把与西方文化大规模接触开始时的西方文化观，即18、19世纪西方人对西方文化的观念当成了西方文化的本来面目，毫不犹豫地在两者之间划上了等号；可西方人却正是从这时起，通过历史主义的清凉剂，头脑逐渐开始冷静，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连天炮火和遍地尸骨，则促使他们对自己的文化观和整个文化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批判。由于西方文化并非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因此中国人无法对它有像西方人自己那么深刻的体认。尽管西方文化外在的弊病还是被一些中国人不同程度地看到了，并提请国人注意，但对上述三条基本信念却很少有人怀疑。这样，它们就成了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中国人文化心态的一种基本立场。即使坚决反对“西化”的人，也往往从反面接受了这些信念，所以才会口口声声什么都是中国古已有之。他们实际上只是把上述这些信念所包含的价值判断颠倒一下而已，这些信念的基本内容他们却以颠倒的方式接受了。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三个基本信念对中国人文化心态影响之深。

在这种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下，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道路注定是一条漫长曲折的崎岖之路。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国粹”和“西化”之争虽然可悲地反映了中国人基本文化心态没有根本地改变，但也是一面无情的镜子，照出了我们心理上、思维上和精神上的许多缺陷和弱点。首先就是缺乏冷静的分析和分辨的能力，对于文化各种成分的不同性质和功能，没有加以应有的区分和不同对待。例如，既然自然科学似乎是无所谓文化差别的，因为它研究的是自然事物的一般规律，

那么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似乎也是如此，因为它们既然是科学，就是研究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因而同样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殊不知人文世界的确不同于自然世界。如果说操不同语言的人实际上没有相同的颜色经验的话，那么在不同的文化形成的不同的人文世界中，事物的确更有巨大的不同。正如张光直先生所说的：“近代的社会科学是西方文明历史的产物，是西方文明历史经验的总结。因此，它的一般性法则，实际上是很自然地适用于西方文明历史的法则。”^①然而，当我们将西方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成果用于研究自己的文化时，照搬和亦步亦趋则是致命的危险，它实际上将增加真正的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困难。因为任何文化建设严格说来都是一种创造，离开了自己的创造，任何独立的文化实际上都不可能产生。这从文化的总体上来讲是如此，从具体的文化领域来看也是如此。

当然，文化创造决不排斥引进、借鉴和吸收其他文化。但这种引进和吸收始终应该伴随着反思和选择、消化与贯通。法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指出：“历史学告诉我们，人类只不过是在孤立与交流的某种平衡中发现了它的独创性，各种文化应该交流，否则它们就会僵化。但是文化交流不应太快，否则就没有时间吸收，没有时间把从外面借鉴来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②不幸的是，中国人与西方文化的广泛接触发生得太迟，蓄之愈久，发之愈速，一旦国门打开，各种西方文化思潮一涌而上，使中国人目迷五色，无暇分辨，重综合而轻分析的传统在这里又大显身手。在上述三个基本信念的支配下，西方文化一概成了先进、科学与希望

①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4页。

② 法国《快报》，1986年，第1841期。

的象征。即使在语言学研究这种民族特殊性很强的研究领域，人们也往往过于重认同而轻求异，以致不管汉语本身的特点怎样，仅仅根据西方语言的某些优点就对汉字的价值提出了疑问，认为汉字与西方拼音文字相比已经落伍了，应该走各国拼音文字的共同道路。但一个民族的文字是与它的语言相适应的，近代中国语言虽则是多音节的，但究竟还是以最简短的单音节双音节为主体，并且同音的词语特别多，声调的变化又很有讲究，用拼音文字写一般的东西也许让读者连猜带想多思索一会就可以对付过去了，但要记述历史，传播艰深的思想，创作复杂的文学作品，拼音文字肯定不适于我们的语言。唐兰先生讲过这样一件往事：有一位推行国语的前辈，用解放前公布颁行的国语罗马字写成一本日记，十余年后重新找到，读起来有许多地方连自己也完全不记得了^①。可是，在上述三种基本信念支配下，人们往往可以无视或忘记许多重要的事实。但是，邯郸学步，削足适履，只会使自己的步子走得更慢。完全依赖别人的东西来建立自己的文化，只能南辕北辙，适得其反。一个民族光有政治上的《独立宣言》不行，还必须有精神上的《独立宣言》，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民族在文化上失去了自我意识与独立意识，就失去了思想和灵魂。而一旦失去了自己的思想和灵魂，一切热情和努力都将显得可笑与可悲，一切希望和憧憬都将破灭成为泡影。

然而，面对以往的历史，不应该只是发几声感慨，道几句遗憾，而应该记取历史的教训。无论在中国新文化建设史上，还是在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史上，教训都是沉痛而发人深省的。例如，“在《马氏文通》出版后，人们一面批评《马氏

^① 见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12页。

文通》的模仿，一面却从《马氏文通》模仿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立场上进一步后退，惟以英文语法为模范，使西方之风愈演愈烈”。正如申小龙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反对西化又更深地陷入西化，这种历史的悖论在当时是无法解释的。然而从今天考察文化断层的新观察系来看，模仿和反模仿的共同历史悲剧是没有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语文现代化的支撑点。”或者说，批评《马氏文通》的人所要反对的实质上不是模仿西洋文法本身，而只是反对马建忠的不成功的模仿。尽管陈望道、张世禄、郭绍虞、王力、吕叔湘等前辈一再强调汉语的特殊性，坚持汉语研究必须从汉语自身的特点出发，然而在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实际研究中，跟在西方语言学后面亦步亦趋、盲目模仿，还是一个十分令人不安的现象。

从《马氏文通》算起，中国现代语言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其间当然取得不少成绩，然而，完整的汉语理论体系至今尚付阙如。语言学家们津津乐道于语法分析，为西方语法范畴与汉语事实大相扞格伤透脑筋，却没有反思一下语言研究究竟所为何事？语言本质如何？西方语言学的观念本身有无局限性？汉语的特殊性是否意味着中国语言学应该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研究汉语这样与印欧系语言差别很大的非形态语言，应不应该有一套自己的科学范畴？照搬西方语言学的范畴是否行得通？怎样改造、更新古代语言学研究传统，使其在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发扬光大？我们对西方语言学中已嫌陈旧的把形式描写作为语言学的首要任务的信条深信不疑，只顾埋头于语言事实的整理和描写。殊不知描写、整理和分类都只是科学的初级阶段，科学的根本目的是要理解事实、说明事实、解释事实，使人们对于事实有越来越深刻的把握，一门学科如果只是无目的地整理与描写事实，那它实